

邁向九七的香港社會及天主教會

湯漢

今日的香港已從一個漁港發展為國際商業中心。它原是中國領土，分三個階段逐步變成英國殖民地。首先，大清帝國因鴉片戰爭失敗，被逼簽訂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又把南九龍割讓予英方。最後，透過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而把北九龍、新界及各離島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多年前，當英國提出延續租借期限，而中國卻要求對整個香港體現其主權時，「一九九七」問題便開始出現。經過長時期的磋商，中英雙方政府終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簽署了《聯合聲明》，訂明整個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

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仍保持現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經過五年的討論和諮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會議於一九九零年四月正式頒佈《基本法》，成為管治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它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亦保證香港現行制度及港人生活方式不變。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條清楚列明，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限制宗教自由，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亦不限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沒有抵觸的宗教活動。」但《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

不少香港人對未來仍缺乏信心，移民外國。

正當香港人對前景感到疑慮之際，胡振中樞機發表聲明，呼籲香港天主教徒要以「身為中國人」、「身為香港人」及「身為天主教徒」為榮。他指出：「身為中國人」，我們要重視中國文化的積極因素，採納發揚；我們不但要熱愛祖國，也應把愛國心擴展提昇，以世界為國，以天鄉為家；「身為香港市民」，我們不但要協助香港社會維持安定繁榮，更應致力於香港人在精神及物質生活上的全面均衡發展；「身為天主教徒」，我們要肯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天賦的基本人權，並應在羅馬教宗的領導下，與普世教會保持共融合一，建樹本地教會特色，發揮基督徒服務精神。胡樞機在一九八五及八六年兩度訪問中國大陸時，一再提到香港教區由於天時地利，應為建設中國、造福香港，作出更多貢獻，且在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負起橋樑使命。之後，在一九八九年頒發的《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鼓勵我們香港天主教徒關心祖國的弟兄姊妹，以推動

修和作為我們的首要任務，並且發展信仰小團體，使修和任務更有效達成。我今就香港社會和天主教會的現況及未來，作進一步的個人反省。

「一國兩制」

《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許諾的「一國兩制」能否確實保證香港在九七後不會有突然的政治地位的變動？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五十年間中國內部局勢的發展。

對「一國兩制」的解釋，中國領導層大致上傾向兩種不同觀點，即務實觀點及意識型態觀點。

持務實觀點者雖然仍講共產意識型態，仍講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以及堅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但在實際行動上比較偏向實用主義政策。很多香港人都希望這些務實派人士能突破意識型態舊框框，使中國步上更光明的前途；只要中國能容許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使香港繁榮下去，他們

亦能接受這種觀點。

另一方面，很多中國領導人還是馬列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只是爲了照顧目前現實，不得不暫時作出一些改變。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述先教授指出：「他們成天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認爲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說的話。」（註一）對這些人來說，「一國兩制」是指社會主義中國只需要採用資本主義制度一些經濟方法。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兼經濟學家錢俊瑞，在杭州的一個重要理論討論中透露了中央的方針說，今後半個世紀中，中國人民面臨的大挑戰之一，就是實行這種新型社會模式：「中央爲準備這種局面的到來，先試辦經濟特區，再開放十四個城市，以便學會用資本主義的長處來改革社會主義，使到大陸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能大大提高。同時我們又在大陸搞精神文明，這樣搞六、七十年，不愁中國會搞不好。」錢氏又說：「中央制訂對香港的方針是服從於全國的發展方針的。」（註二）

錢氏的「文明二分法」在現實上似乎有點一廂情願，因爲在經濟運作上普遍用了資本主義，又怎能抑制相連的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無可否認，中國與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合作，將設法獲致兩種主義制度中的優點。但後果可能恰恰相反，屆時他們也許會發現自己正被資本主義精神文明所改造。一九九二年初，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訪香港時曾預測：目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對南中國的經濟影響，最終會導致大陸的政治改進。台灣和南韓的經驗證明，隨着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將不斷湧現，他們會受到更高等的教育，尊重真理，能獨立思考，相信個人尊嚴，支持社會的自由開放，堅信政府要對人民負責，這時，人權與民主亦自然會從地區內部浮現。這裡，我並非是要高捧資本主義，因爲今日任何成功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因素，而且健全的法制及個人品格的提昇對任何社會的改進都是不能或缺的。

中國的政治性格

正當一九九七臨近之際，香港受中國的影響會越來越多，香港教會要致力與共產政權展開對話。我們應分清楚，不接受無神主義意識型態是一回事，而能與那些接受無神主義意識型態的人交談合作又是另一回事。在基本信仰上我們不能妥協或出賣自己，而且愛國也不只是歌功頌德或盲從，但爲了社會大眾利益，我們卻可攜手合作，甚至捨棄一些與教會本質無關的權利。我認爲，我們今後與中國共產政權交往時，一要認清北京的「底線」，二要認清中國對事情解釋的獨特方式，三要認清中國人的「公用語」和「私用語」之間的分別。

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先生，曾給「底線」下了一個頗恰當的定義。他說：「底線」就是中央政府的寬大極限，超越了底線就是踩入禁區。底線有許多層面，最重要的自然是權力的底線，即未來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力關係。

根據《聯合聲明》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並享有高度自治權」。這「高度」究竟有多高？當日吳學謙外長在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劃了一條「底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絕不意味帶有任何政治實體的性質」。因此，不能「獨立」或「要求獨立」是這種權力關係的底線。（註三）

李怡又指出：中國有悠久且輝煌的歷史文化，自視爲世界的中心。如果夷蠻願意臣服進貢，則但不對他們欺壓，相反的還多給賞賜。中共建國後，政權也不知不覺繼承了這個傳統，就是：中國的尊嚴不容觸犯，吃軟不吃硬。幾年前，一群專業人士在報章上刊登了一則廣告，引起中國政府方面不滿，原因是廣告中有這句話：「我們認爲香港人與中國政府應該互相諒解，建立信任基礎」。中國方面認爲這句話表示「中國政府」與「香港人」是處於平等的關係，而不是中央與地方（即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中國認爲香港人應信任中國政府，而不是

「香港人」與「中國政府」應互諒互信。（註四）這就是中國對事情解釋的獨特方式。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沈宣仁教授提醒我們注意中國「公眾語」和「私用語」的分別。一位在北京大學接受哲學訓練的人士，把它們稱爲「台前語」和「台後語」。中國人民慣從大眾傳媒和小組學習的文獻（例如《人民日報》社論）中學習「公眾語」或「台前語」，然後在公眾場合覆述。只有當你信任他們，他們也信任你時，他們才會以「私用語」或「台後語」向你說出真心話。當然，有時一些中國人亦會透過「公眾語」去表達弦外之音，比如十多年前廣州市幾位青年以「李一哲」筆名發表大字報，就採用了毛澤東思想的用語去批評時弊。（註五）至於如何分辨語言的層次？這就有賴每個人對中國語言、文化和歷史政治的修養和觀察力了。

香港的歷史角色

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九一年十二月在香港發

表講話時，籠統地指出：「香港最重要的優勢，在於法律制度。這是上海和整個中國將發現最有價值、而又最難建立的社會基礎結構。」（註六）但沈宣仁教授就香港的歷史角色問題卻較全面性地指出，香港在過去三十多年有飛躍進展，當然是香港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可是我們不能忽略一些有利香港安定繁榮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源於英國的法治制度，它使到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權得到保障。並且，人人享有信仰、思想、言論、通訊、出版、教育、就業、居住、旅行、結社、集會、請願等自由。工商界更有充分的企業自由。法治與自由使香港成爲多元及開放的社會，造成香港的安定繁榮。

香港也是逃避專政、苛政或其他災難的避難所。一九四九年以後大批中國難民移居香港，一九七五年以後從越南來的難民也不少。香港給他們喘息機會和自由呼吸的場所。所以，法治、自由、創新精神及人道主義，這一切才是香港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的要素，也是對中國最重要的貢獻。（註七）

一位香港政府顧問於九二年初在一個私人聚會上表示對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和樂觀，他的理由並非建基於外在實況，而在於香港人長期克服困難的內在能力。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時很多居民逃離香港，但戰後都回來參與建設，使香港很快便成爲一個大城市；五零年代，很多難民從中國大陸赤手空拳來到香港，但香港很快便吸納了他們，解決了他們的住食和工作問題，這些人也令香港變得更興盛；一九六七年，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香港曾發生騷亂，但很快便平息下來；今天的香港並沒有天然資源，有的只是人力，但卻能成爲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及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目前廣東省經濟的突飛猛進，使香港與廣東省的生活水平差距日漸縮小，因此，我們沒有理由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

香港天主教會的未來

天主教於一八四一年傳入香港，是今日香港最大的有組織性宗教團體，也是全球最大的華人教區。

據一九九二年八月香港教區傳播處的統計，教友三十五萬，包括約九萬的天主教菲律賓職工在內；神父三百五十位，中外各半；修女七百，華籍爲主；修士七十名；堂區六十三間；醫院六間，診療所九間；學校二百七十五間，學生近三十萬；社會服務機構十四間，宿舍十一間，安老院廿九間，傷殘康復宿舍七間。雖然近年不少教友移民外國，但每年仍有約二千位成人及二千名兒童新領洗者，爲教會帶來活潑生氣的現象。本地神職人員逐步負起領導教區的角色；教友也不斷參與堂區的牧職工作，參加聖經、神學或教理課程的學員很踴躍，數字達至五百。還有很多追隨福音理想的小團體定期聚會，分享聖經祈禱，加深信仰實踐。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團體組織同內地相應的團體組織的關係，應以互不隸屬、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爲基礎。」但隨着九七的來臨，互相影響是不能避免的，所以我們對國內教會的原則不能沒有辨析力。

由於歷史及政治因素，中共政府要求國內教會保持獨立自主，推行「自治、自養、自傳」的政策，主要目的是擺脫西方文化和外國傳教士的影響，抗拒羅馬的中央集權制和家長式領導。我認爲普世化及本地化都同樣是必須的；「三自」只要把次序倒轉過來，變成「自傳、自養、自治」，不但正確積極，且合乎福音精神。爲什麼「三自」要首先推行「自傳」？因爲正如梵二《教會憲章》的次序，我們應先談天主子民，後來才談教會聖統；每位教友領洗時都接受了普通牧職，分沾基督的司祭、君王及先知的使命，便應負起傳福音的任務，這叫做「自傳」。當這些教友日趨成熟，能用聖經祈禱養活自己，又能對教會產生歸屬感，將自發地給予教會更大人力物力支持，達成「自養」的目標。在這樣熱心成熟的教會團體中，亦自然會逐漸浮現教會領袖和獻身修道的種籽，產生具備資格和有才能的神父、修女、修士，滿全「自治」的要求。這樣的神職人士及教會領袖自然會發展出一套中國神學，揉合中國

傳統文化的積極價值，亦植根於聖經和教會傳統，有助解決當地的問題，向普世教會發放異彩。

幸好，在聖神的領導下，香港教會已在這條路上邁進。很多堂區已擁有或正在準備教友擔當讀經或協助施行聖事的職務。當神父不在時，教友派送聖體給病人、領導團體祈禱、或主持禮儀，已是十分平常的事。更難得的是，很多堂區都設有慕道班，由教友當義務傳道員。研經之風亦逐漸推廣；教友很自覺地給予教會經濟上的支持。唯一遺憾的，是修士修女聖召短缺，很多女修會只有一兩位修道士，教區男修院近年來亦每年只得一名新生加入，距離「自治」之途尚遠。

粗略看來，外籍傳教士在香港教會仍佔神職人士總數之半。他們的臨在除了有助解決目前香港教會的繁重牧民工作外，還能使香港教會的多元性質更趨豐盛，提示本地教會負有向外傳福音的責任。

過往，由於中國國力的積弱，老百姓思想崇洋，加上本地教會大多倚靠外國傳教士，因此，老一輩

的教友仍深深懷念外籍傳教士。今天，本地神職人員已逐步負起領導教會的責任，外籍傳教士退居輔助角色。但什麼是輔助角色？他們該採取什麼心態？能貢獻什麼？面對這些問題，很多外籍傳教士都感到迷惘。有些老傳教士，昔日曾獨當一面，對着自己今天的處境，感到百般無奈，因此對很多事情看不順眼，諸多挑剔。而部份新一代傳教士則顯得無所適從，有的凡事採取被動的態度；另一些則偶然發表一下意見，但旋即遭到中國神職人士或教友的「中國觀點」的反駁，掃興而退。其實，我以為外籍傳教士必須肯定一點，他們的信仰背景比本地教友及神職人士深厚，他們的貢獻及特點就在於透過實際生活及人際接觸，把這份深厚的信仰感染本地教會，不時提醒本地教會從信仰角度去衡量一切。本地神職人士的優點則是把信仰結合本地生活及文化，互相取長補短。

前香港教區艾巧智副主教曾指出，香港教會也受到社會上一般心態的影響，緊隨一般人對個人主

義的崇尚，認為沒有什麼比得上「成就」更為重要，結果忽略了捨棄、貧窮和簡樸等基督徒價值觀。我認為，外籍傳教士從昔日的第一線退居第二線工作，正好是這些基督徒價值觀的有力見證，幫助本地教會重新發掘「十字架」的意義。我們清楚知道，共產國家內的天主教在活動上受到一定限制；雖然本法保證香港情況將例外，但香港教會仍該未雨綢繆，以防萬一。（註八）我認為外籍傳教士退居第二線的善表豈不就是提醒本地教會，要把希望埋在更深的泥土裡；即使基督徒的宗教活動自由及公開宣示信仰的自由受到局限，教會仍能默默地臨在於社會中，信仰仍可變得更為深厚堅強。

教區的橋樑教會角色

自一九七零年代末期鄧小平重掌政權後，中共推行四個現代化，給予大陸宗教信仰人士較大容忍程度和活動空間。但一九八二年頒佈的新憲法，其中第三十六條有關宗教信仰的條文，仍把「宗教信

仰自由」與「宗教活動」分開論列，指明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換言之，未得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動常有被認為「反革命活動」的可能。此外，一九八零年，在政府推動下，大陸重組天主教架構，把一九五七年建立的愛國會一化爲三，變爲「愛國會」、「教務委員會」及「主教團」。一九九二年九月，這三個組織又改爲兩大組織，即主內務的「主教團」、主外務的「愛國會」。但二者的從屬關係，則沒有說明。同時，不少成員一身兼掌兩個機構之職。雖然如此，從重開的約三千所教堂（聚會點未算在內）、廿四所男修院及三十七間女修院的數目看，近年中共政府亦表達了一定的開放誠意。

由於三十多年與外間的隔閡，不少公開教會的神父及主教處境困難，要面對心理、神修、以及憂慮如何追上梵二的精神等問題。目前他們大多數面對的主要不是信理問題，而是牧民問題。

全國天主教友（官方數字是四百萬，但非官方數字則是八百萬至一千萬）的大多數，包括一些神

職人士在內都忠貞果敢，爲保存信仰的完整性而作出偉大貢獻，非常值得敬佩。但他們亦差不多完全與現代思潮脫節，尤其需要領略及實踐現代教會學的精神，俾能肯於開放、諒解、寬恕、促進教內弟兄姊妹間的共融合一。

有時，不參加愛國會的人士，爲了領受聖事而進入由愛國會成員主持的教堂。在某些地區，有沒參與愛國會經已成了次要的問題。亦有些以前不肯加入愛國會及坐過監的神職人士，爲了教會前途及照顧教友，今天願意重新出來工作。

中國社會政治背景不斷變化，而中國天主教會的回應也千變萬化。大陸之大及複雜，很難拼湊出一幅比較完整的圖像。它受過創傷，需要愛的治療。它亦是一個多元化的教會；同時面對着危機與良機，承受着鉅大的壓力和豐盈的恩寵。「六、四」事件和東歐政變後的大陸教會會受到更大壓力，政府對待「地下教會」的態度亦更爲強硬。但自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視察中國南方以後，政治氣候又轉趨和

暖，教會亦因而享有較多活動空間。無論如何，聖神常與教會同在，祂超越任何制度的圈囿而繼續活動，領導着教會不斷向前。由於很多教友的生活見證，以及藉着在教堂範圍內所舉行的教理講授，教會繼續每年增加新成員。男女修院的聖召亦很旺盛。很多地方已開始推行禮儀革新。

除了為中國教會祈禱外，全球天主教徒應響應教宗近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南韓漢城及梵蒂岡發出的呼籲，體念手足深情，把握時機，關懷大陸教會。我們應以平衡明智的態度，既不必畏懼亦不流於天真，透過切合時宜且無不良後果的方法，給予他們精神及實質的支持，使大陸教會不但能與普世一至、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結合一起，並能生根植基，發揚本地精神，福澤衆生。

香港教區提供給中國的協助交流，隨着大陸的開放，也由於不少本港神職人士和教友的主動熱心，顯得多姿多彩，計有：協助國內社會服務質素之提高和擴展，應大陸男女修院之邀前往授課，促進國

內教會禮儀革新，給大陸牧靈人士提供書籍，支援修院、教堂的修建等等。其中以明愛機構及聖神研究中心較具規模。前者著重社會服務，後者強調牧民培育。由於某些工作需要互相配合，因此大家經常保持緊密聯繫。

香港明愛與中國的接觸，始自一九八零年。當時，明愛應深圳特區總工會之邀，為深圳幾個不同單位，舉辦了英語、行政管理、酒店業務等培訓課程。之後，明愛對大陸的服務逐步擴展，合作對象包括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及教會團體。所提供的服務主要是在教育、醫療及社會服務的範圍內。一九八六年，明愛還籌募本地及海外贊助，成立了「中國服務計劃基金會」。明愛協助大陸的出發點是以實際方式履行基督徒愛的理想。它並不傳教，卻在中國法律容許的範圍內，以服務去見証福音。

聖神研究中心則代表着牧民路向。它於一九八零年成立，目的是為了使教區能接觸到國內不斷轉變的情況，作出適當的回應；並推動香港教友聯同

全球教友，負起關心中國教會的責任。過去十二年來，中心不斷剪存資料、研究出版、及推進與國內天主教人士的積極交談。

中心訂購百多份報章雜誌，以中英文為主，使我們的剪存資料能追上時代。我們出版《鼎》雙月刊，引發國外人士對中國基督宗教的興趣，促進與國內宗教人士的交談。我們也出版《主愛中華》及《China Bridge》，分別附於香港教區的中文《公教報》及英文《Sunday Examiner》內，使香港教友增強對中國天主教的認識和關心。中心亦向國內寄發《寰宇之聲》月訊，協助縮窄國內外教會之間的鴻溝。此外，中心的成員多次探訪大陸，以促進會談交流；接待來港訪問的中國教會團體；亦應訪問中國的旅客之邀提供行前講座。中心也給近年新開辦的男女修院提供一些書本及教育工具，作為對培育國內未來司鐸及修女所作的一點小貢獻。

一九七九年當胡樞機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告知我有關教區有意成立中心之事時，他同時指出中心

要盡量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既堅持教會尤其梵二所釐定的原則，亦開放予秉持任何立場的人士，與他們展開交談，謀求合一共融。胡樞機曾鼓勵我們引用聖奧斯定的原則去處理教會內部的分歧：「在必要的事上，應有統一；在懷疑的事上，應有自由；在一切事上，應有愛德。」

堂區的橋樑教會角色

由於香港與中國在地緣及血緣上的密切關係，亦因中國改革開放所產生的吸引力，愈來愈多香港教友希望能進一步關心大陸教會的弟兄姊妹。

在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神秘感仍籠罩神州大地，國內天主教會的實際情況並不為外界所了解，中心的成員經常應不同的堂區邀請，向堂區的善會及慕道班講解中國教會實況，並指出中國教會經驗對香港教會的啟發。許多堂區的傳道組都將「中國教會」列為慕道期的課程之一，而這些課程更往往吸引其他堂區成員的興趣，廣受歡迎。

隨著中國門戶不斷開放，香港個別教友到大陸旅遊或公幹者與日俱增，他們不少與國內教會人士建立友誼，回港後仍保持聯絡。這些教友在堂區內組織祈禱聚會，為中國教會及中國國運祈禱，並相約暢遊神州大地，拜訪教會名勝及朝聖地點。這些教友往往自發組成中國教會關注小組，繼續保持與國內弟兄姊妹的聯繫，在精神及物資方面互通有無，增進情誼。有時還會吸引原先對中國教會抱消極態度的教友，成為積極關心中國教會的人士。

台灣著名神學家張春申神父曾就國內公開與非公開教會的現況，提醒擔當橋樑角色者應注意自己的基本態度。他指出，基督徒有很多層面的共融：所有基督徒都同屬一個耶穌基督的教會，同享有在天主聖三內的恩寵生活，領受同一的洗禮，閱讀同樣的聖經，所以大家應避免衝突，加強愛德合作；但天主教信仰還進一步要求「聖統性的共融」，不僅接受同一的耶穌基督，而且要接受教會內教宗的首牧責任，因此我們亦應對維護教會正統者的努力

表示衷心敬佩。（註九）香港教友已逐步對張神父提出的基本態度取得共識，並希望能盡一分力量承擔橋樑角色。堂區教友與國內弟兄姊妹的聯絡，雖然僅出於個人或小組名義，但重要性絕不稍減。由於不代表任何機構，這些關注小組更能自由地與不同的團體接觸，亦無需擔心涉及地上與地下教會的爭執；且作為一個聆聽者，有助雙方加強溝通。

堂區教友在國內參觀及交流的時候，不斷聽到許多動人的信仰見證事蹟。本港教友在感動之餘，也愈發激起信德，加強身為天主教徒的信心。國內教友的宗教經驗，成了宣講的材料之一。另一方面，眼見國內教友在困乏中仍努力不懈，更激起本港教友的熱心，珍惜香港教會眼前的豐富資源，積極投入本地教會的建設工作。

結論

美國文學家愛默生說得好：「人們如果可以選擇出生的年代，可不是變革的年代麼？在變革時代

老一輩與年青一輩並肩在一起，互相比較；每一個人都充滿憂慮和希望，老一代的光榮歷史逐漸消退，被新時代的豐富生機所填補。這個時代，一如其他時代，充滿一切美善，只要我們知道怎樣去做便成了。」（註十）我欣賞這種積極態度，但基督徒還有更深更遠的看法，因為我們深信九七早已存於天主救世計劃的具體方案中，而這天主聖意不但說明了九七問題的根由，也解釋了為何我們接受九七事實的動機。無論面對什麼轉變，香港教會始終要保持信仰團體的本色，見證福音，成為「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註十一）香港教會的力量來自她對歷史主宰的信賴、她的倫理道德操守、尊重異己的氣度、和堅持善必獲勝的信念。

附註

一·李怡著，《香港前途與中國政治》，香港臻善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一九八五年，頁114。

- 二·全上，頁110-116。
- 三·全上，頁200-201。
- 四·全上，頁205。
- 五·沈宣仁著，《三十年來情與理》，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一九九二年，頁162-164。
- 六·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華僑日報》社論。
- 七·《三十年來情與理》，頁171-172。
- 八·艾巧智著，香港天主教，見《鼎》第二十五期（一九八五年），頁13。
- 九·張春申著，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見《鼎》第六十一期（一九九一年），頁13-15。
- 十·見 *The Complete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Brooks Atkinson, ed.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0)。
- 十一·梵二《教會憲章》1。